

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逻辑^{*}

——以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为例

胡 炜 方长平^{**}

【内容提要】 民粹主义已然成为 21 世纪的一股政治潮流。然而由于概念的空心和诉求的多变，民粹主义成为描述集群运动的一种命名标签和价值符号。本文结合政治经济学的集体行动理论，将非理性因素引入政治市场，认为民粹主义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民粹主义兴起于社会变革下人们舒适感普遍降低时期；民粹主义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精准切割迎合大众需求，塑造“精英—民众”的区隔；民粹主义依靠集团成员数目的增加通过民主制度攫取政治权力；民粹主义的发展受到议题替换以及现实成本增加的制约；民粹主义运动因民众及其领袖固有的集体行动模式而无法胜任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文章继而以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为案例，检验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特朗普执政期间的表现，发现其过程基本符合民主制度下引入非理性因素的集体行动理论模式，其表现和衰退契合集体行动逻辑的推论。未来，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存在着相互借力的需要，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发展，将加剧政治极化。

【关键词】 民粹主义 集体行动 桑德斯 特朗普 美国政治

* 感谢《世界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人评审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 胡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方长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民粹主义已然成为二十一世纪重要的政治主题。在 21 世纪初的二十年时间里，世界见证了民粹主义从个别区域开始，演变和汇聚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民粹主义的身影可追溯至中东北非动乱的街头政治中，潜藏在各地区国家领导人的变更中，更显现于欧洲极右翼政党上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中。全球民粹主义运动频发的现象促使人们思考一个根本问题：民粹主义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又会发展至何种形态？民粹主义绝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它植根于人们的内心不安与躁动。直到 21 世纪初变化的环境才迫使我们在这一民粹主义“大爆炸”的时代中探寻其根源。

一 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研究误区

相对于日益繁盛的民粹主义运动，有关民粹主义的研究一直处于次要地位，民粹主义从属于民主政治并封闭在国家内部的“黑箱”中。关于民粹主义，学界尚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和有效的分析框架。目前，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基本概念大致有三点共识：第一，民粹主义强调民众的价值和合法性；第二，民粹主义包含“民众—精英”二元对立的认知思维；^① 第三，民粹主义以社会动员的方式进行活动。^② 由此可见，人民和民众是民粹主义的价值核心，包含了人民主权和多数决定的合法性逻辑。但民粹主义中的民众是空心化的概念，具体成员构成根据具体的国家环境而各有不同。同时民粹主义由于缺少具体的利益诉求和稳定的意识形态，需要吸纳一定的政治主张为己所用。^③ 因此民粹主义在真实世界中极具多面性：民粹主义会根据不同的社会需求调整政治供给，从而扩大成员数目；民粹主义会与不同的社会理念相结合，呈现不同的社会运动形态；民粹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有“双刃剑”的作用，拥有民主化和集权化双重功能。

① 参见 Ghita Ionescu and Ernest Gellner,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The Garden City Press, 1969, p. 4;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19; Giuliano Bobba and Nicolas Hubé, *Populism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COVID-19 Crisis i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 2.

②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p. 42–43.

③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p. 19–20.

由于民粹主义概念的空心和诉求的多变,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分析存在一定的误区,其结果是民粹主义成了一种命名标签和价值符号,很多现象只是简单地被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民粹主义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简单从民粹主义概念的发展历史来梳理民粹主义的脉络,未能深入分析民粹主义的历史背景。^①这种分析割裂了民粹主义与其具体历史环境的联系,而且历史上各种民粹主义的代表、诉求、相关利益和表现方式各有不同,不能用学术标签一以论之。正确的方法应是异中求同,并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把握民粹主义的演变趋势,最终立足于对当代民粹主义政治的理解。第二,将民粹主义置于某一政治思潮、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下,未能系统地分析民粹主义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研究喧宾夺主,实质上仅仅分析了民粹主义所结合的部分。最典型的研究方法是单纯将民粹主义分为左翼和右翼,但却不能解释左翼民粹主义包含右翼主张,右翼民粹主义包含左翼主张的现象。^②第三,多数研究局限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未能分析民粹主义和社会完整的互动过程。一些学者也解释了产生民粹主义的社会失衡,但对民粹主义者上台后不采取社会补救措施的现象感到疑惑。^③民粹主义运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网络一直未在理论上被充分地建构出来,致使对民粹主义运动过程的分析较少,所以学界才会有模糊的“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④的感慨。第四,未能细致地阐述民粹主义的发展阶段,缺乏对民粹主义兴起、高潮和衰退一贯的因果解释。一般研究都消极看待民粹主义运动中支持者的作用,并从民主程序正义的角度否定民粹主义的合法性。故研究多聚焦于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阶段,结论几乎都认为民粹主义将为强势人物上台铺路,形成威权政治,消解自由民主。^⑤

① 如果不分析历史背景,很多历史现象会被混为民粹主义,例如集权背景下的法西斯主义。参见 Federico Finchelstein, *From Fascism To Populism in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 46 - 124.

② Paula Biglieri and Luciana Cadahia, *Seven Essays on Populism: For a Renew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Hoboken: Wiley, 2021, pp. 20 - 31; Tjitske Akkerman, Sarah L. de Lange and Matthijs Rooduijn,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③ David Cayla, *Popu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 5.

④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9页。

⑤ 对此类问题的批评可参考 Karine Tournier-Sol and Marie Gayte, *The Faces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 New York: Springer, 2021, pp. 57 - 60.

上述误区的问题在于将民粹主义运动与政治集群运动等而视之，关注集群运动的形式，而忽视运动的动力和过程。“民粹主义并非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逻辑——一种用来对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① 民粹主义“是一门语言，讲这门语言的人将普通人视为一个高尚的群体，但该群体深受其自身阶层的限制；民粹主义认为其精英对手们是自私自利和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寻求方法，动员前者，抵抗后者”。^② 民粹主义依然遵守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只是民粹主义具有不同于精英的特殊的话语权力和身份价值。特殊的话语权力和身份价值在具体民主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民主运作模式就是民粹主义运动。^③ 上述定义虽然没能清楚地展示民粹主义的运动逻辑，却启示我们要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民粹主义运动的言语表达和社会需求上（动员大众和政治成功的方式）。如果我们清晰地描述民粹主义运动如何提供和提供何种政治话语产品以及民粹主义和社会市场的供求关系，那么民粹主义“善变”之谜将会得到彻底解答。

依循这种供求逻辑，民粹主义的研究必须回答五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民众为何选择民粹主义这种运动形式？——现实的政治系统在输入、输出和反馈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些人积极参与，一些人却置之不理？第二，积极参与者的共同身份和相似理念源自于何处？人们为何选择这些身份和理念？——这种身份和理念所塑造的“民众—精英”的意识框架如何调和群体中个体不同的差异？第三，民粹主义的社会运动又是凭借什么转述并传播自身对精英的愤懑和不满？——它是以何种方式说服公众有关人民主权的有效性？第四，民粹主义如何在民主制度内冲击精英政权的合法性？简单的利益诉求已经不能解释民粹主义政党泛滥的现象。第五，民粹主义运动在何种情况下会消亡，以及在何种情势下作为政治力量有效地执政？

要想满意地回答以上五个问题，就必须在民粹主义运动的模式中寻找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动机以及民粹运动成功的供给和组织方式。本文将结合一种较早的经济学组织理论来分析民粹主义运动的模式，探讨民粹主义运动的起伏以及

① 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7页。

② 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7页。

③ 参见 Pierre Ostiguy, Francisco Panizza and Benjamin Moffitt, *Popu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Performative and Discursive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21 - 43。但此书研究的是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没有进一步和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

“民粹”合法性会被削弱的深层原因。

二 民粹主义运动的集体行动逻辑

1957年安东尼·唐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发展出的“理性无知”概念：寻求政治的博识是非理性的，因为信息所提供的廉价回报不能补偿他们在时间及其他资源方面付出的成本。一张选票即使产生政策改变带来收益，但是给个人带来的预期收益几乎为零，因此公民几乎不会去参与投票等社会运动，群众会选择理性地忽视政治。^①“理性无知”成了解释公共选择的基础前提。1965年奥尔森进一步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创新性地解释了集团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行为方式的逻辑：集团中个体成员只能获取他为集体物品支出所带来收益的部分，而其他成员能以搭便车的形式免费得到集体物品，因此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低于最优数量，成员为集体提供公共物品的动力就越低。^②依照奥尔森的推论，集团必须采取“选择性激励”机制以避免个体成员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③

民粹主义运动很明显符合公共选择和集团提供公共物品这两种集体行动形式，但是依凭对政治经验的观察我们也能判断出，民粹主义实际上不符合相关的理论解释——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个体成员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民粹主义组织也存在一个发展壮大的阶段，这与集体行动理论截然相反。

实际上被命名为民粹主义的群体运动也正是集体行动理论所能解释的例外：以往未关注政治的人群开始投身于政治并主动寻求政治上的改变。民粹主义运动中个体的自利心理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极端，个体的政治积极性在一时间出现了高涨。究其原因，集体行动理论过于关注市场经济的理性个体假设，而忽略了政治市场中观念作用的特殊性。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界定观念上的偏好，将社会认知纳入对政治收益和成本的考量之中，集体行动则又能在民粹主义的解释中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①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 259.

②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6页。

③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第34—35页。

（一）将非理性因素和成员数目引入政治市场

我们姑且将个体投身民粹主义运动的政治热情看作一种违背个体日常收益的非理性。^①按照基本的供求理论，民粹主义提供的非理性属于一种商品，非理性的数量与价格成反比。如果非理性要求个体付出价格（代价）很高，个体则会拒绝支付。但不同于经济市场，对非理性的需求不是来自个体的经济需要，而是来自于个体观念上的偏见，而观念上的偏见源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的舒服的感觉。^②换言之，如果个体对特定的非理性错误选项有强烈的利益和情感认同，且无须为错误选项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个体就会凭舒服的感觉行事而选择非理性行为。因为非理性舒服感所带来的情感价值超过其错误成本。更可能的情况是，假如非理性不能对个体造成有实际影响（损失既可用金钱衡量，也能用支付金钱的损失痛楚来衡量）的代价，且非理性的舒适感有递增趋向，根据最大满足效用逻辑（也就是理性的作用），个体会执着于充分的非理性行为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舒适感，此时非理性行为数量接近无穷大。

将非理性的个体舒适因素考虑进去，一张选票虽然不能产生政策改变带来的实际收益，但是会给个人带来认同理念上的满足感。如果社会变革进一步对原满足感造成威胁，那么感受到舒适感降低的公民几乎都会参与投票等社会运动以抗议社会变革。个体的政治行为也就颠覆了安东尼·唐斯的“理性无知”的推论。在重新定义政治心理收益和成本的前提下，集体行动在政治市场亦成立。

奥尔森所言个体付出的代价永远低于在集体中获得的利益的情况，在引入非理性舒适度因素后就会变成另一种状况：非理性成为公共物品后，根据上文供求分析，非理性带来的舒服感会足够强大，足以满足个体舒适感要求。同时政治集团的兴盛不是单纯依靠实际公共物品的增加，而是政治集团的规模扩大。那么非理性通过宣传等工具就能够不断外溢，寻找或刺激需要非理性舒适感的个体成员，不断增进集团规模，明确非理性目标，直至未被集团纳入的社会其余部分全部包括进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民粹主义运动大多依靠“人民”的数量力量以

① 理性一般意义上为物质效用最大化，文中非理性行为指社会环境制度下成功概率较小的行为，非理性在此指个体行为不遵循现实环境中物质效用最大化逻辑。

② 心理学有舒适区（Comfort zone）概念，指的是一个人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习惯性的行为模式，人会在这种状态或模式中感到舒适。

及需求社会的持续关注。而现代人民主权理念和传媒机制也易于导致民粹主义势力的扩大,帮助“局外”的民粹主义主流化。^①

依照改进后的集体行动逻辑,民粹主义的产生需要两个要件:一是社会变革(表现为社会结构变化)导致个体舒适感降低而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可动员群体;二是在一定的民主制度(人民主权和多数决)下,集体运动可以依靠广泛吸收社会成员来增加自己的政治选举实力。舒适感降低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结构变化程度,二是个体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接受程度。社会结构变化可以通过统计测算财富、阶级和族裔等指标的变动来衡量;接受程度以及相关实际利益的计算则要复杂得多,需要观察人群对主流政治理念的态度(主流政治理念反映了国家应对变化的基本态度)。而成员数目表现为选举团体获得选票的数量。在以往的政治学理论中,左右政治理念是舒适感差异的测量指标,左右翼政党支持率代表着持有相关理念的成员数目。随着左右翼政党的逐步接近,以及中间选民的扩大,传统的左右政治理念越来越难用以表述人们实际舒适感的下滑。然而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影响以及大众和主流政治的理念差异总会被表达,新的“民众—精英”认知差异的形成和扩大促使了民粹主义的兴起。

一旦“民众—精英”的二元对立认知被大众所确立并接受,大众的集体行动将会基本按照“民众—精英”的划分标准来行动,这也是民粹主义运动领袖所期望达成的目标。^②因此民粹主义运动会不遗余力地将各种议题和“民众—精英”的划分标准联系在一起,从而发泄民众的不满。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敌人反对的就是我支持的”,“民众—精英”差异观念的赋予必须根据具体国家的社会环境变动所形塑的各种舒适感差异来进行准确匹配,否则“民众—精英”的二元对立认知将不能得到人民——“买方”的支持(因此民粹主义领袖在不同区域会有不一样的政治宣传)。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必然是寻求最多的不满群体以赢得广泛的群众动员。以美国桑德斯左翼民粹主义为例,其在竞选中提出了大众普遍感到不舒适的九大问题——寡头政治、民主衰退、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税收问题、教育负担、刑罚之重、弱势群体以及媒体操纵,并在不同的州强调不一

①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avide Vampa, *Populism and New Pattern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pp. 5-6.

② Marnie Lawler McDonough, “Demagogue for President: The Rhetorical Genius of Donald Trump,”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20, pp. 236-237.

样的主题。^①在这个过程中，民粹主义领导的形象充实了民众未来期望的存在，而民众成为领袖选举获胜的工具。^②民粹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将社会不满凝合成政治不满，壮大民粹主义人员的数目以促使民粹势力进入政治系统。

（二）民粹主义运动中的观念竞争机制

在实际社会中，非理性观念的供求机制（领袖的观念促销和民众的观念需求）类似于竞争性市场机制，民粹主义运动的起伏与此密切相关。

首先，非理性观念在供需平衡的情况下，多余供应带来的边际成本实际为零，这意味着民粹主义运动的供给不能给个人额外的满足感（除了民众参与其中的快感或被组织的秩序感），不能增加集团个体的利益，只能持续扩大集团规模。因为民粹主义运动的扩张动力几乎全部来自于自身人数的增加，所以在一个国家达到供求平衡情况下，民粹主义发展实质处于停滞状态，其政治力量等于现有人数规模带来的政治地位。准确来说民粹主义动员了曾经沉默的公民从而增大了选票获胜的概率。

其次，非理性与理性以及诸多非理性观念之间同时存在“卖方”的竞争。个体可能拥有相冲突的不同观念且不同观念间异质性差异的程度不同，换句话说，民众对不同观念的需求弹性不同，非理性观念之间以及非理性观念和理性存在相互替换的可能。比如，如果民众认为民粹主义运动将严重冲击宪法所规定权利，危及自身的价值观或利益，民众会撤回对非理性的支持；如果民众认为性别政治比环境保护更重要，那么主打环保议题的民粹组织的吸引力将减弱。

最后，如果非理性观念带来的满足感收益低于持续参与付出的现实成本，由于公共物品的性质，部分民粹主义者转向“搭便车”行为，民粹主义即将进入奥尔森所言“少数剥削多数”的阶段。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竞选日期截止之后。因为“民众—精英”的对立，民粹主义运动在体制内所取得的授权和支持相对孱弱。而依照集体行动理论，民粹主义动员的民众在选举后失去选举目标回归日常生活，在新的成本利益衡量中（工作生活或继续投身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不会将支持进行政治制度化。在支持人数减少后，民粹主义领袖由于

^① Bernie Sanders, *Our Revolution: A Future to Believe in*,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6, pp. 5–6.

^② Bert Olivier, “Freud on Group Psychology and Leaders: The Case of Donald Trump,” *Psychotherapy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2020, pp. 1–13.

是依靠成员的数量获得政治权力，故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动员和议题扩展来提高关注度以获得体制外的授权。民粹主义运动所形成的政治集团既没有传统政治集团拥有的从政积累，又缺乏有效的体制内支持，很难担当进一步改革的重任。

综上所述，民粹主义兴起于社会变革下人们舒适感普遍降低时期，其发展需要非理性观念参与者的加入，并受到议题替换以及现实成本增加的制约；民粹主义运动在社会中形成强大的“民众—精英”分隔，质疑体制内的合法性，以此为口号整合多种议题；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必然是在民粹主义高潮时期维持现有议题的关注度，以源源不断新增的支持者为政治基础，通过民主或选举程序（准确来说是多数决定原则）扩展自身政治势力；民粹主义运动因民众及其领袖固有的集体行动模式而无法胜任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民粹主义运动可能会转而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维持组织的生存，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党纲，走传统政党政治道路。但此时民粹主义运动就背离了“民众—精英”的自我诉求，民粹主义是否能进一步赢得民众的支持尚存在疑问。

不同于有组织夺取权力的集团组织行为，对政治权力欲望的激励在民粹主义运动中表现并非很突出，民众更可能反感对权力有野心的领袖。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运动研究分析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不足以解释民粹主义个体的自发行为，而引入非理性观念（对政治机构和自身行为有价值判断的文化因素）和选举成员数目修正后的集体行动理论更能详细分析现代社会民粹主义运动的发展。通过评估政治市场的观念竞争，民粹主义的起伏和衰败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这让我们对民粹主义的深层行动逻辑有了更好的把握。

三 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集体行动逻辑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涌现出桑德斯领导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两者因为强烈的“民众—精英”视角而同时被定性为民粹主义，但两者的结局并不相同，特朗普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帮助下凝聚了共和党党内的共识，战胜了对手希拉里，最终赢得了美国总统选举；而桑德斯领导的左翼民粹主义输掉了民主党内初选，内部很多支持者最后将选票转而投给了特朗普。两者都作为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备受关注，让学者们惊呼“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造后的集体行动理论能让我们细致入微地揭示其中

的因果逻辑。我们以 2016 年美国大选的左右翼民粹主义为例来检验其民粹主义运动模式是否符合集体行动逻辑所包含的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舒适感降低、人们遵循非理性因素进行投票、观念竞争以及民粹主义领导人依靠特定议题赢得选票等相关步骤。

首先我们必须从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中找到吸引人群参与选举的关键议题。桑德斯领导的左翼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实际具备一些相同的政治主张，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反对寡头政治，鼓励大众政治；第二，抵制自由主义对外贸易政策，维护美国的相对利益；第三，抗议媒体巨头控制民众的所见所闻，要求民众舆论的真实表达。^① 以上政治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对国家政策表示了严重不满，从而衍生出“民众—精英”两分的立场。民众对长期以来的精英政治、自由贸易以及媒体垄断积郁了不少负面情绪，这成为 2016 年吸引公众参与选举的主要因素。依据原始的集体理论，每个单一的民众不会认为自己的一张选票能够改变选举结果，尤其是在建制派垄断了既有政治和媒体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在诸多投票限制和生活现实的选择下，民众最佳的理性选择是政治沉默——放弃投票。但是抑郁的情绪最终会爆发，数量可观的民众克服了各种不便参与了选举，非理性偏好占据上风。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斗争贯穿了 2016 总统选举的历程：在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赢得了 46% 的选票但基本上没有超级代表的支持；^② 特朗普则战胜杰布·布什为代表的建制派，压制住了长期游走于体制内的克鲁兹和卢比奥，成功赢得初选；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以 304 票对 227 票击败原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 45 任总统。^③ 整体而言，2016 年大选中政治世家的建制派身份遭到了民众的彻底否定，民众的反对由对单个精英的反感凝聚成对整个建制派有目的的否定，反映了两党选民对建制派精英较为冷漠，传统选民结构有重大变化，“非理性”投票因素在民众中占据主导。

① Iain Noble, "A Question of Trust: How and Why the Polls Underestimated Support for Donald Trump," *Sociological Forum*, vol. 36, no. 2, 2021, pp. 559–560.

② 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會危机》，钟舒婷、周紫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9—90、122 页。

③ Kennedy Courtney, Blumenthal Mark, Clement Scott, Clinton Joshua D, Durand Claire, Franklin Charles, McGeeney Kyle, Miringoff, Lee Olson, Kristen Rivers, Douglas Saad, Lydia Witt, G Evans, "An Evaluation of the 2016 Election Poll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82, no. 1, 2018, pp. 1–33.

美国左右民粹主义共同的三个议题凸显了一个群体——美国劳工阶层对主流政策的失望。在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随着制造业的转移，美国劳工阶层受害最大。然而两党都没能很好地代表这一弱势群体，共和党关注减税和财政赤字，民主党侧重于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族裔和精英的选举支持。在2008—2016年奥巴马执政时期，总统行政命令多在减排、控枪和性别平等等边缘议题上有所成效，而劳工阶层受惠最多的医保改革在2017年却不幸夭折。^① 共和党凭借茶党的“草根政治力量”在几年内陆续重新主导参众两院，利用制度制衡左右议程，降低了政府推行新政的效率。^② 在两党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利于劳工阶层的政策迟迟没能显现，导致劳工阶层社会与经济地位日益下降。劳工阶层参与2016年选举，“非理性”地集体表达了一种不被代表、被忽视的不舒服感觉，这是民粹主义运动力量的重要来源。

劳工阶层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多重含义，具体来说劳工阶层又被族裔概念进一步切分。在美国现行的选举机制下，族裔多被用来动员以赢取各州选举。选举中劳工阶层就要在族裔认知和经济认知之间做出取舍。白人劳工阶层更多会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因为与其父辈30年前总体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纵向对比，难免会生出失落感。有文章指出控制已知的影响投票选择的预测因素，包括经济评估、性别歧视态度、种族歧视怨恨、地位威胁，以及社会人口指标，种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影响白人投票选择的独立因素对选举有重要影响。^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鲜有维护白人劳工阶层利益的政策，而有色人种则在民权运动以后地位和被关注度都有所上升。成功的民粹主义除了要满足劳工阶层的经济不满表达需求外，也要避免族裔问题对此产生的削弱和竞争，甚至需要利用族裔问题来巩固扩展自己的选民群体。

桑德斯左翼主要关注中下层民众经济，其提出了致力于平价的医疗改革和最

① 总体上奥巴马不能在国会顺畅行使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导致大规模范围的立法失败。参见 John D. Graham, *Obama on the Home Front: Domestic Policy Triumphs and Setback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关于茶党的书籍可参考 John M. O'Hara and Michelle Malkin, *A New American Tea Party: The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Bailouts, Handouts, Reckless Spending and More Tax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1; Joseph Farah, *The Tea Party Manifesto*, New York: WND Books, 2010; Dick Armey and Matt Kibbe, *Give Us Liberty: A Tea Party Manifesto*,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10。

③ Jack Thompson, "What It Means to Be a 'True American': Ethnonationalism and Voting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7, no. 1, 2020, pp. 279–297.

低工薪标准；特朗普迎合被忽视的白人中下层人民，认为精英过分地倡导少数人群和族裔的权利，导致白人群体的利益受损。桑德斯的民众更接近于经济上的民众，而特朗普的民众则进一步有种族的划分。因此桑德斯进一步抓住民众的焦点是经济分配议题，其强调民众的团结，并且反对将种族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而特朗普能在倡导白人优势的种族制度上吸引选民，其反对移民的口号和美国再次伟大的排外主义无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具体而言，特朗普企图通过减税和企业优惠来带动就业的发展，因为未提出社会再分配议题，其经济议题的吸引力要稍弱于桑德斯，但是特朗普与种族议题相关的言论则能激起更多以往不积极的白人选民的支持。

虽然桑德斯持有再分配议题的优势，但是仍不足以击败建制派的希拉里。桑德斯左翼民粹主义在凝聚起其所能动员的最大民众之后，就陷于停滞了。后期分析显示桑德斯的选举团队在各州少数族裔动员方面策略不太奏效，例如：在内华达州，很多出席桑德斯演说的拉丁裔并未参与投票；在南卡罗来纳州，桑德斯没有争取到非裔的支持。^① 希拉里的族裔基本盘反而能瓦解桑德斯在劳工阶层的凝聚力。在多个州，桑德斯最终以极小的百分比惜败给希拉里，^② 桑德斯自始至终只能赢得愿意参与投票选民的较少部分。究其原因，经济议题不足以调动更广泛的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和老年居民）参与选举。按照集体行动理论，在非理性议观念竞争中，桑德斯的经济议题动员的民众数量不足，其经济议题无法瓦解希拉里从政所积累的选举基本盘，不能激励支持对手的民众转移到自己的阵营。桑德斯左翼民粹主义的选举策略的缺陷在于其在民主党选举机制内不能接触更广泛的中间选民。桑德斯是独立政治人士，但其参与民主党党内选举，在民主党内获得的支持不多，无法通过政党组织或超级代表深入到选民之中。^③ 桑德斯的经济分配政策在民主党内难以赢得共鸣，民主党过于关注固有的选区和资金支持，并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不太愿意在全国范围强调经济平等。左翼民粹主义在政治选举市场内遭遇到民主党精英理性

① 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周紫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② 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周紫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13—123页。

③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桑德斯在29岁以下人群中的支持率是84%，在独立党人士中支持率是69%，但以纽约州选举为例，由于民主党纽约州“非开放式初选”，300万无党派人士无法参加选举。

的反抗。

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之外又关联起移民和种族问题。虽然特朗普的主要矛头是拉美裔移民,但本质上则是立足于族裔身份定义的本土主义。2011年考虑参加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就曾质疑奥巴马的出生证明——猜疑其并非出生在美国而无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几项人口统计调查对白人本土主义又起了推波助澜的所用:200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至2042年,美国白人将有史以来不占据多数地位;^①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拉丁裔在人口数量上已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②2008年奥巴马当选后,一直人数占优的白人阶层在迷茫中产生了一种恐惧和挫败感,并引发了一种需要自我保护和族群团结对外的共同感。茶党和共和党右派的兴起就是最好的证明。根据集体行动理论中需求弹性不同所造成的观念替换原理,白人工薪阶层更可能为了保护其社会的等级制度而投向共和党,因为各方面的利益损失远不及维持白人地位带来的心理舒适。与桑德斯左翼相比,特朗普右翼联系族裔问题的做法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特朗普在关心经济问题的选民之外还能调动更广泛的白人阶层。只要白人阶层占摇摆州未曾被动员的中间选民多数,白人阶层多数支持特朗普,而少数族裔未提升投票率,那么特朗普就有战胜希拉里的可能。事实也的确如此。

依据2016年选举结果,在经济议题动员下的白人选民选择继续支持种族议题的概率要高得多。2016年白人投票率创下1984年以来历史新高(2018年中期选举投票率也顺势被大幅拉高)。^③特朗普在各个年龄段、各个教育水平的白人选民中得到的票数都比希拉里多,而且在绝大部分不同收入水平的选民中都击败了希拉里,除了那些经济安全水平最低的选民(年收入低于5万,多是有色人种)。^④特朗普凭借白人阶层巩固了共和党在南方和中西部的基本盘,并成功

① Conor Dougherty, "Whites to Lose Majority Status in U. S. by 2042,"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4, 20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1867492705539109>; Ed Pilkington, "US Set for Dramatic Change as White America Becomes Minority by 2042," *Guardian*, August 14,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aug/15/population.race>.

② Anna Brown, "The U. S. Hispanic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ix Fold since 1970," February, 2004,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2/26/the-u-s-hispanic-population-has-increased-six-fold-since-1970/>.

③ Roper Center, n. d., <https://ropercenter.cornell.edu/how-groups-voted-2016>; The Roper Center at Cornell University put Donald Trump's 2016 share of the white vote at 57 percent, 1 percent less than CNN's number.

④ Isabel Wilkerson, *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20, pp. 330 - 331.

动员了铁锈地带的白人劳工群体。对比 2016 民主党初选结果以及总统选举结果，特朗普和桑德斯一样在铁锈地带赢得了密歇根、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和西弗吉尼亚；但特朗普大选表现得更为出色，增加了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38 张选举人票）。特朗普的动员策略发挥了预期效果，其民粹主义较好地融合了经济和族裔议题，顺利扩展自己的选民，直接导致了希拉里在 2016 年总统选举的失败。

四 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衰退的集体行动逻辑

民粹主义集体行动逻辑中成员数量扩展的优势帮助民粹主义在选举中取胜，但是这种方式具有固有弊端。首先，民粹主义成员扩展与政党选举体制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其议题和大众动员的选举方式不一定被政党所接受；其次，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局限于政治选举的语境下，民粹主义依赖多数取胜的选举规则，但是体制外的动员方式很难在执政上有进一步的作为。政治合法性和民众自利的集体行动逻辑将阻碍其进一步发展。这些在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受政党政治规则制约的左右民粹主义

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在体制内遭到了民主党竞选机构的强烈抵制。桑德斯是独立派进步主义人士，以佛蒙特州参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和民主党有深入的合作，因此参与民主党初选。可桑德斯的声望远远不如树大根深的希拉里，其参与初选被认定为“搅局者”，遭到民主党超级选举人的集体抵制。^①整体而言，桑德斯对民主党内部力量起到了分裂作用，其疏散了部分支持民主党的工薪阶层的选票。由于经济议题遭民主党反感，桑德斯不得不自己筹款进行一场场的个人演说来动员更多的民众关注经济议题，其效率远远比不上依靠党团和领袖系统支持的希拉里。

特朗普并未有任何从政经历，其依靠夸张的言论和强硬的个性，赢得了共和

^① 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會危机》，钟舒婷、周紫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0 页。

党多数人的支持。而特朗普依靠禁枪、种族和移民等话题巩固了共和党的保守意识形态，以赢得总统选举为中心将共和党团结在了自己周围。^①桑德斯输掉初选后，民主党未能对桑德斯所提出的经济议题做很好的整合，使得特朗普的经济宣传成了桑德斯的替代。特朗普聪明地没有具体透露自己在国内再分配政策上的倾向，即使是反对医改也打着反对奥巴马的幌子，这样也就没有违背共和党减税和削减政府开支的宗旨。因此特朗普右翼民粹主义通过共和党既有的传播体系进一步扩张，将自己的政策意图扩展至更多的人群中。特朗普接触的选民范围更广，甚至可以调动不积极的白人中间选民。

大选结束后，民粹主义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竞选时民众产生的是一种舒适感的满足，但如果真的进入制定政策阶段，各种议题动员所产生的实际个人收益，最终会被巨大的外部市场稀释。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将逐步减少民粹主义参与者的规模，规模的减少即意味着民众授权的减弱。桑德斯左翼民粹主义随着桑德斯的败阵而逐步失去动力，更重要的是桑德斯提出的美国现有政治的问题很少被引入主流的政治话语中。桑德斯提倡的“我们革命”的运动并没有在美国社会范围内展开，桑德斯最后也只能回归到佛蒙特州参议员的职位上。

特朗普在共和党的支持下开启了总统生涯，共和党看中的是特朗普在白人人工薪阶层的影响力和巨大票仓，党派背景对特朗普的影响比他的任何前任都大。最近一项研究追踪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重大事件后对特朗普的褒贬。在多数情况下，共和党和民主党做出的回应是一致的，对特朗普的政策产生了有力的制约。有关经济的问题进一步分化了党派对特朗普的看法，至少共和党支持特朗普对经济和重大事件的反应。总体上，共和党需要特朗普在选举时维持自己的选民，同时在执政期间继续在经济问题上抵制民主党的各项福利和征税政策。但在政体结构和政治正确方面，共和党与民主党基本保持一致，^②对特朗普在右翼民粹主义中受欢迎的对法律不公、精英腐败和移民政策的抱怨，始终只能停留在口头之上。特朗普仅让美国政治向右偏转一些，其成就

① Pierre Ostiguy, Francisco Panizza and Benjamin Moffitt, *Popu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Performative and Discursive Approach*, pp. 118 - 120.

② Brian Newman and Otto Amber, "Polls and Elections: The Economy and Events Still Matter (at Least a Little): Partisans' Presidential Approval in the Trump Era,"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4 November, 2020 (online version) .

包括在联邦法院中增加保守派成员，以及在外交上从多边主义转向更多的双边主义。

综合来看，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在民众动员层面被民主党的党团和领袖系统所遮蔽，特朗普极具民粹特色的精英体制改革议题因失去共和党的支持而烟消云散。美国的政党体制尚未做好接纳民粹主义的准备，其不愿也不可能体制内采取扩展成员数目的方式来实现民粹主义的议题。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逻辑与美国政党政治的逻辑并不兼容。

（二）民粹主义在执政中的衰退——集体行动的自我束缚

特朗普执政时期延续了民粹主义时期的快感政治和明星效应，不断夸下海口以引起民众注意，但其手段也就止步于此。尚沉迷于民粹主义运动成功之中的特朗普在人事安排、总统行政、总统立法以及危机应对四个方面^①均没有突出建树，民粹主义原先集体行动的多数原则无法在总统执政层面奏效。

人事安排是总统行政的基础，正确的人事安排保障总统政策的执行。特朗普称其在执政后会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2021年最新的一项关于总统是否选出了最优秀的人的政府服务调查显示：特朗普在提名重要官员方面行动迟缓，联邦行政人员认为总统任命的人不如布什政府任命的人或现任政府的公务员能干。调查数据还揭示了特朗普并未能阻止公务员整体行政能力的下降。^②

总统行政主要看白宫机构的责任表现，重点是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和达成行政目标的有效性。特朗普执政期间，由于人事安排不当，造成政府丧失关键专业知识来源。总统和白宫之间开始出现分歧，各官员竞相在集会上反驳、解释、改变或否定总统的推文和声明。这进一步导致制度规范的弱化，加剧了相互推诿和不作为的现象。^③

① 格林斯坦评估总统采用了沟通能力、组织能力、政治动员能力、预见能力、认知能力和智力六个标准。笔者依据总统与白宫和国会关系，从人事、行政、立法和危机处理四个功能性方面评价特朗普执政成效，比较其民粹主义领袖行事方式在总统功能性方面的效果。参见 Fred I. Greenstein, *The Presidential Difference: Leadership Style from FDR to Barack Obam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David E. Lewis and Mark D. Richardson, "The Very Best People: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Management of Executive Personnel,"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21, pp. 51-70.

③ Karen M Hult, "Assessing the Trump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21, pp. 35-50.

总统立法取决于美国总统驾驭国会推行相关重大政策的能力,总统作为一个协调者和组织者在三权分立体系下发挥作用。特朗普在竞选时,声称自己在谈判协议方面拥有独特的技巧。^①然而刚上台不久,特朗普就陷入了困境。不同于媒体曝光时的光彩万丈,特朗普在议程设置上完全被动,缺少主动驾驭政策议程的魄力。尽管一些经济计划得到了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但国会几乎没有通过任何重要的立法。^②总统从民主党那里获得的支持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关键的新医疗政策、移民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政府停摆和对其外交政策的象征性打击是特朗普任期的特点,即使他的政党控制着立法机构。在民主党人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获得众议院控制权后,特朗普立法成功的机会就更少了。

危机处理更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的败笔,特朗普总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危机处理。疫情曾一度有所好转,但在政府放松管制下又大规模爆发,甚至特朗普本人也被感染。有文章用早期预警、危机沟通、危机决策、官僚管理和公众反应五个标准来评判时,发现特朗普对危机过于轻视、自信于全民获得性免疫的神话、缺乏雷厉风行的危机管控手段、不能统一联邦和各州的行动并且只注重自己支持者的反应。^③综合特朗普执政期表现来说,借由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完全不能胜任美国总统这一职位。

特朗普执政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粹主义这种集体运动模式不能进一步承担政党执政的功能。民粹主义独有的体制外的动员方式仅仅增加的是成员数目,而未能替代传统政党培养政治人物接替政府工作的职能,也不能制定成熟的党纲和政治方案。特朗普执政时的政策反复无常且相互矛盾,让人猜想其重视利益而没有原则。实际上,除了总统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特朗普成功推行的政策多是迎合共和党的主张。关键人员的任命,尤其是在大法官职位的安排上需符合共和党保守派的喜好。特朗普本人缺少从政经验和强大的政治资

① 一个重要的区分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就是作为民粹领袖和政府领导人的区分。民粹运动属于认同领导模式,将领导视为领导者有能力促进与追随者的认同感,而政府领导则在于政策和人员的管理。参见 Mazlan Maskor, Niklas K. Steffens and Haslam S. Alexander, "The Psychology of Leadership Destabil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2016 U. S. Presidential Debat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42, no. 2, 2020, pp. 265 - 289.

② George C Edwards, "Was Donald Trump an Effective Leader of Congres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21, pp. 4 - 34.

③ Jeremy D. Mayer, "The Contemporary Presidency: Two Presidents, Two Crises: Bush Wrestles with 9/11, Trump Fumbles Covid - 19,"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3, 2020, pp. 629 - 649.

源，其团队成员一再变动，民粹主义运动产生的“民众—精英”区隔依旧延续至政治系统内部。

特朗普执政失败还在于民众尚不愿意将体制外授权方式直接作用于美国政治体制。民粹主义可以在体制外借助集体行动人数规模的力量来授予领袖“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将领袖推上政府内的职位。随着民粹主义运动这一目标的达成，运动中个体授权行为将不适用于涉及公共利益分配的政府体制。因为体制是社会运转固化的组织形式。进一步民众直接授权将会导致非理性因素侵入现实，造成对个体利益的实际影响，深度授权只会扭曲政治体制的常规运转，民众会在此作一番权衡。调查显示白人群体的团结感在特朗普当选之后逐渐滑落，民众日常的政治道德感又占据了上风。^①此外，民粹主义运动发展需要继续调动民众的非理性情绪来避免“搭便车”行为以强化政治输入，一些学者称其为以注意力为基础的政治。^②最常见的就是民粹主义领导人将议题诉诸媒体曝光和全民公决。而美国普遍存在政治和社会分化，公民的种族和阶层构成不支持民粹主义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全民公决等民粹方法切实不可行。^③

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即使在当前民意中取得优势，一旦脱离了选举背景，进入体制层面则困难重重。因为选举行动动员不同于体制内政治动员，民粹主义运动缺乏政治精英分子作为后续的政治支持力量，而精英在体制内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明显大于一般民众。同时美国现行体制也对民粹主义领袖的集权设下了双重障碍：一方面，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国会和政府近乎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得权力难以集中；另一方面，在两党制下，民主党和共和党皆稳定而有凝聚力，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帮助特朗普夺取了政权，但同时也阻止了民粹主义进一步加强。延续民粹主义风格、强调自我价值、否定政治共识的特朗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表现得无所作为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综合来看，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遗产非常小，民粹主义运动实际被政

① Ashley Jardina, Nathan Kalmoe and Kimberly Gross, “Disavowing White Identity: How Social Disgust Can Change Social Identit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42, no. 4, 2021, pp. 619–636.

② David L Altheide, “Pandemic in the Time of Trump: Digital Media Logic and Deadly Politics,”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 43, no. 3, 2020, pp. 514–540.

③ Gabor Ferencz, “When Democracy Trumps Populism.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6, no. 3, 2020, pp. 339–341.

党政治所利用来进行选举,受政党选举规则的制约。选民遵循政治集体行动的逻辑,在选举中利用人数规模优势来表达自身的愤懑和失落感,但在体制内实际的政治作为中难有进一步的成效。民粹主义最终只是将已经分裂的民意进一步确认和极化,迎合时下特定议题中民众的偏好,但其缺少坚定的积极分子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政治系统内不能取代传统的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逻辑受限于选举场域,无法移植到政治制度中。民粹主义若要进一步发展,除了自身融入政治制度中以外,还需要其领导人发挥高超的政治技巧来弥合传统精英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分歧。

五 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民粹主义发展到今天绝不是一个偶然,民粹主义已然成为新时期人们表达自身政治不满的工具。本文避开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符号型群体运动的研究视角,以民粹主义的集体行动模式为核心来考察民粹主义的演变流程。本文同时借助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作为案例检验,其模式基本符合民主制度下引入非理性因素的集体行动理论模式,其兴起和衰退契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逻辑。

民粹主义如此成功的关键在于议题的切分要精准地契合社会的裂痕,但又不能对民粹候选人的支持者人数产生消极影响。以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的运动过程观之,民粹主义都要借助传统政党的力量参与党内初选,民粹主义领袖需注重政党拥护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政党组织为根基,民粹组织者进一步诉诸原有的社会分歧来扩展人数,而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必然不会和美国政党组织的观念相冲突以防止政党对其疏远。简言之,美国的民粹主义需要政党的传统选民和组织为基础,传统的政党组织虽然没有失去其政治功能,但是却在其选民中失去了代表性。民粹主义在美国恰恰续合了政党和部分选民之间断裂的联系,而两党选民观念的极化又让政党必须借助民粹主义来赢得选举。这种相互利用造成了民粹主义的得势。

但为什么政党如今的议题整合并不像过去那么有效以至于失去代表性?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此依然有效:两党精英都没有政治利益激励来整合经济议题,同时亦没有激励消解族裔问题的影响。党内选举的获胜越来越依赖于个体政治竞选募集资金的能力和超级选举人的支持。体制内精英若倡导经济议题,那么首先将失

去超级富豪的竞选资金支持。而避免族裔问题影响就要宣扬公民团结，那么候选人将进一步失去党内族裔和宗教领袖的政治支持。体制内精英失去的政治经济资源将比其所获得的民众支持要少，因此敢于冒险的只有两党政治下的局外人。

作为检验的案例，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有其特殊性：其一，美国独有的种族差异和民主制度可能会影响本文的说服力度。但两者不影响本文整体的逻辑。种族差异是社会舒适感差异表现的一个方面，即使其他国家没有种族差异，民粹主义者也会选择重要的异质性观念来塑造“精英—民众”的区隔。其二，美国的民主制度较之欧洲的议会民主制度权力重心更体现在总统身上，但美国民主的制衡机制更完善，基本民主选举制度差异不大，符合形成民粹主义运动所需要的民主环境。

基于以上民粹主义运动模式的分析和案例检验，在总体政治背景不变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未来的发展会呈现以下趋势：

首先，民粹主义会以快节奏的方式加速现有的政治进程。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在民主合法性的话语上尚持有主动权，在与原政治体系碰撞的过程中，民粹主义运动会强求政策、政治代表和政治结构体现出其要求的民意。如果反馈失败，民粹主义会通过抗议、公决等方式来强制进行改变。原有的政治进程在选举流程、任期时间、议题选择和权责划分上都是非常明确的，但其变更也非常缓慢。民粹主义会不断要求政治进程重复“选举、不满、下台和再选举”的过程，加速民意的输入和反馈。

其次，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出现的概率较大。民粹主义运动受国家体制框架的限制，在现有政府解决问题不力的情况下，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民粹主义只有政党化和体制化。街头政治和选举公决也会向这一目标靠拢。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的个人选择方案已经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各国政府普遍难以解决公平效率问题（体现在福利制度上）和精英民众间的分歧。民粹主义运动将输送更多的反精英领导者和政党进入原政治体系中，以执行原政体所缺失的民主代表功能。此外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上台会产生示范效应，促进分裂的民意向民粹主义的方向靠拢。

再次，民粹主义会促成传统的政治精英分化。民粹主义运动和政治结构在博弈的过程中，会有相互借力的过程，传统的政党和政党内部派别会在某些议题上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以赢得政治席位或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而民粹主义者也

会力图选择接近其观点的代表人,以减少进入政治结构的阻力。^①民粹主义的“民众—精英”二分思维顺理成章地进入主流政治进程中,被党派间的斗争所利用,加深持不同政治主张精英的分化。现阶段约3/4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的2020大选受害者的言语,^②这给美国两党体制蒙上了阴影。

最后,民粹主义会激活一些边缘议题,冲击政治体制的稳定。族裔问题就在2016年的选举讨论中被激活并进入政治议程中,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感。这些边缘议题一般缺乏刚性的法律予以规范,所以大众运动在实践中就会缺乏相应的行为准则,以至于很容易突破公民权利的界限。由于大众共识尚未形成,加之又难以通过正常的政治议程来为边缘议题设置准则,现有的政府公信力将受到严重冲击。在美国,经过特朗普的执政后,美国总统的权威明显下降,一些体制和机构的原则受到破坏。^③精英需要以巧妙的方式将边缘议题从政治议程中分离出来,以避免政治走向极端化。

民粹主义宜疏不宜堵,民粹主义的多数规模带来的政治影响是符合民主体制的,压制民粹主义只会从侧面否定民主的合理合法性。要想避免民粹主义对政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依循集体性的逻辑原则,政治家就必须从社会背景出发,预防民众满足感的降低,同时将民众非理性偏见的成本提升到影响现实利益的高度,如此方能阻止民粹主义运动依靠成员数目攫取政治权力的行为。对美国而言,经济问题是关键,经济复苏带动民众舒适感的回升将有效避免选民保护自己族裔地位的决心,并降低民粹主义在中间选民中的动员力度。倘若美国两党无法代表选民利益,那么即使民粹风暴平息,下次选举中又会出现另一个“桑德斯”或“特朗普”。

① 已有文章分析了美国两党评价总统执政的差异,表明两党在特朗普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加剧。参见 Gary C. Jacobson, “Donald Trump and the Parties: Impeachment, Pandemic, Protest, and Electoral Politics in 2020,”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4, 2020, pp. 762–795。

② Gary C. Jacobson, “Donald Trump’s Big Lie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2, 2021, pp. 273–289。

③ James P. Pfiffner, “Donald Trump and the Norms of the Presidency,”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1, no. 1, 2021, pp. 96–124。